

# 上 篇

## 第一章 伟大的历史转折

从 1978 年 12 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行到 1982 年 9 月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之前，中国共产党一共举行了五次中央全会。这一时期，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实现了党的政治路线的根本转变，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此后才有了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领域内的一系列巨大变化。因而，这四年的时间，是党和国家全面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重要时期。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发生这一伟大历史转折的开端。中国社会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转折，是因为经过了新中国在建国后革命与建设实践上的胜利与失败的多次反复，在认识上经历了正确与错误的多次比较后，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成功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从此，中国走上了一条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建设道路。正确道路的开辟，是以思想解放、端正思想路线为前提，以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为认识依据的。这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在中国达到了一个新境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也由此而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历史性的飞跃，使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前程似锦。同时，是中国共产

党在执政道路上逐步走向成熟的又一标志。

## 一、中华大地沧桑巨变的起点

###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在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百业待举。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方针和政策，彻底扭转十年内乱所造成的严重局势，使中国从危难中重新奋起。

#### 1. 邓小平重返政坛，发表面向新时期的政治宣言

第一，邓小平复出，发起对“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批判。1977年7月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恢复了邓小平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和“三副一总”的职务，即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邓小平重返中国政坛。在此之前邓小平曾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拒绝了华国锋要邓小平在出来工作之前先写个文件，必须写明“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的要求。他说：“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但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1977年4月，邓小平写信给中央，提出“我们必须世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尖锐地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意思是说，他们都没有说过凡是他们说的做的都绝对正确、不能改变这一类的话。在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再次阐述了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重大问题。他说：“我说要

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这次会议还决定把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并决定提前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中央全会反映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对于进一步揭批“四人帮”和恢复邓小平的领导职务，起到了关键性的历史作用。

但是，当时党的主席华国峰仍然在各种场合宣扬“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两个凡是”实质上是割裂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和坚持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同时在此错误方针影响下，中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又出现了“大干快上”和高指标的“左”倾错误。例如华国峰在 1977 年 4 月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上提出要在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即 1976 至 1980 年间，全国至少要有 1/3 的企业办成大庆式企业，要求石油部门为创建十来个大庆而奋斗。过多地向重工业的投资，造成了工农业之间的比例失调。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两个凡是”错误思想的阻碍，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还不可能发生根本的转变。1977 年 8 月举行的中共十一大即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举行的。它一方面宣告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文化大革命”已经经束，一方面又极力肯定毛泽东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完全正确的，今后要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还要搞多次“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政治运动。由于“左”倾错误指导思想的严重束缚，使党和国家的工作面临前进中的徘徊局面，中国正处在重大的历史关头。

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大闭幕词中又一次强调了要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传统的的问题。他倡导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对“两个凡

是”“左”倾教条主义的批判，实际上成为思想路线上拨乱反正的先导。中共十一大以后，在纪念毛泽东逝世一周年之际，一些老同志发表文章论述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和作风，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例如，聂荣臻的文章《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陈云的文章《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等。1977年12月10日，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他随即遵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深入进行调查研究，着手为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而作准备工作；另外，在胡耀邦任中央党校副校长期间，主持中央党校的工作，曾经针对“文革”造成的混乱局面，提出了要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是非“重新颠倒过来”。这样，实践中也就必然提出了究竟什么是判断是非的标准问题。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批老同志对于实事求是传统的积极倡导，对“两个凡是”的批判，对于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二，开展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掀起群众性的思想解放运动。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发表了由胡耀邦审阅定稿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提出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第二天的《光明日报》发表此文，12日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由此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

这篇具有战斗性的文章，从根本上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阐明了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原则。任何理论都要不断地接受实践的检验。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而是随着实践的发展会不断增加新的内容、新的观点和新的结论，同时也不断地扬弃那些不适合新情况的旧观点和旧结论。如果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

思想的现成条文、现成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实践，是非常错误的。那种认为“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观点，是“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必须打碎。文章发表后，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但是，这篇文章遭到了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和副主席汪东兴等人反对，因而这场大讨论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压制。华国锋指示中共中央宣传部对讨论“不表态”、“不卷入”。负责宣传工作兼任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的汪东兴指责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的”，责问“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他提出：一不要砍旗，二不要丢刀子，三不要来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并指示《红旗》杂志和各省市领导同志不要发表支持文章。

重返政坛不久的邓小平热情地支持了这场大讨论。叶剑英、陈云、李先念、聂荣臻、徐向前等老同志也都在不同场合强调实事求是的原则，总结党的历史经验，阐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提出了“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在讲话中，他批评一些人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是反对毛泽东思想中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些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这些人观点，实际上就是主张照抄、照转、照搬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原话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违反了中央精神；这可不是个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样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邓小平在讲话中还指出，如果反对实事求是，即使口头上大讲拥护毛泽东思想，实际上也只能是违反毛泽东思想，只能把我们引导到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只能引导到工作的损失和革

命的失败。他发出一定要“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的号召。邓小平的讲话有力地支持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并把它与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问题联系起来，从而把这场讨论推向了高潮。

在这场斗争中，从中央到地方，党政军各部门主要负责人都发表文章或讲话，积极地参与了这场讨论，内容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问题的拨乱反正，讨论的核心及实质问题都紧紧围绕着是否承认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是否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根本问题。1978年6月24日，《解放军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题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原则》的文章，是一篇系统地批判与反驳用“两个凡是”观点的人看待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文章，强有力地推动和支持了这场遇到重重阻力的大讨论。9月16日，邓小平在《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一文中，指出：“两个凡是”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只能损害毛泽东思想。离开实事求是的高举，“是形式主义的高举，是假的高举”。什么是真高举呢？就是从现在的实际出发，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实现毛泽东提出、周恩来宣布的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如果毛泽东没有说过的我们都不能干，那我们现在怎么办？毛泽东思想也要发展嘛！否则就会僵化嘛！在这篇文章中，邓小平精辟地指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毛泽东同志所以伟大，能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归根到底，就是靠这个。”经过越来越深入的讨论与思考，全党、全军及广大人民认识到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一条最根本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

这场大讨论，成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思想大解放的先声，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它冲破了长期以来“左”倾错误思想的严重束缚，也进一步肃清了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对于清除个人崇拜、个人迷信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人们认识到领袖人物、即使是伟大的领袖人物，也会犯错误；领袖人物的言行、决策是否正确，也必须要接受社会实践的检验；换言之，真理的标准，并不是领袖人物的只言片语，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态度，决不能再继续相信“两个凡是”，而是必须要完整、准确地理解它的科学体系和内在的精髓。中国人民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中彻底解脱出来，而且再无重蹈覆辙的反复，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这场伟大的讨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关系到各条战线上的拨乱反正，关系到对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评价，关系到大量冤假错案的平反，更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这场讨论本身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为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奠定了必要的基础，为实现党历史上的伟大转折创造了条件。

第三，邓小平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这篇重要的讲话，是在历经了一系列“左”倾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挫折之后，中国共产党面向新时期的政治宣言。

1978年9月，邓小平提出了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定性意见。中共中央于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召开了工作会议。

这次会议本来是要讨论经济工作的。在会议的既定议程中，没有提到已经开展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和党内外普遍关心的端正党的思想路线、平反冤假错案等问题。对此，许多希望首先解决思想路线是非和重大历史是非的同志很不满意。在分组讨论

中，陈云率先提出系统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意见，引起大多数与会者的强烈反响，从而改变了会议的议程。

陈云在东北组作了重要发言，他提出有六个影响大或涉及面广的问题，需要中央考虑并作出决定，即：要肯定天安门事件是一场伟大的群众运动；要肯定彭德怀对革命的贡献，给予正确评价；要为所谓薄一波等 61 人“叛徒集团案”平反，他们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要为 1937 年“七七”决定和 1940 年决定所涉及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定为叛徒的给予复查平反；要为陶铸、王鹤寿等人平反，他们不是叛徒；要进一步批判康生在“文革”中的错误，康生对中央各部和全国各地党政机关瘫痪状态负有重大责任。这也就是说，要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必须首先解决遗留的与“文化大革命”有关的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陈云的发言一石激起千重浪，立即得到与会同志的支持和响应。会上有不少同志纷纷提出要重新评价和解决“一月风暴”、“二月逆流”、“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文革”遗留问题，同时也要进一步解决好其它历史遗留问题，并对华国锋、汪东兴等人在“文革”结束后两年间继续犯“左”倾错误的问题进行了批判。

在与会者的强烈要求下，会议解决了一批重大历史遗留问题。11 月 25 日，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反击右倾翻案风”平反，为薄一波等 61 人“叛徒集团”案、“二月逆流”案等一些已经查明的重大错案平反。政治局决定撤销中央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纠正过去对彭德怀、陶铸、杨尚昆等同志的错误结论，撤销中共中央专案组，康生、谢富治的问题由中央组织部审查，地方性的重大事件，一律由各省、市、自治区实事求是地予以处理。会议还对

有关真理标准讨论所出现的分歧进行讨论，经过思想交锋，会议要求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呼声更为强烈。12月13日，华国锋就提出“两个凡是”作了自我批评。

中央工作会议经过36天的讨论。邓小平于12月13日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篇讲话阐述了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几个重大问题：

(1) 解放思想是当前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他指出，在许多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间，思想还很不解放，还处在僵化和半僵化状态。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是好同志，这种状态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思想不解放，很多的怪现象就产生了：条条、框框多，不讲党性原则的随风倒，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也就多起来了。目前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这个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没有一大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我们就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就无法赶上更谈不到超过国际先进水平。

(2) 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要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我们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过去，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这就造成了好的意见不敢讲，对坏人坏事不敢反对。当前要强调民主，重申要实行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当前一个迫切问题是要扩大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

唯心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现在的立法工作量很大，人力很不够。因此，法律条文开始可以粗一点，逐步完善，不要等待“成套设备”，总之，有比没有好，快搞比慢搞好。

(3) 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这次会议解决了一些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分清了一些人的功过，纠正了一批重大的冤案、错案、假案，目的是为了向前看，是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我们的原则是“有错必纠”。有的问题不可能一下子解决，但是要尽快实事求是地解决，干脆利落地解决，不要拖泥带水。有的问题，不可能也不应该要求解决得十分完美，要大处着眼，每个细节都弄清楚不可能，也不必要。对犯错误的同志要信任，对人的处理要慎重；选拔干部要严格，对搞打砸抢的、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出卖灵魂陷害同志的几种人，也不能轻易信任，对他们要警惕、要教育。国内外都很关心我们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我们认为毛泽东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绩是永远不可磨灭的，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我们要领导和教育全体党员、全军指战员、全国各族人民科学地历史地认识毛泽东的伟大功绩。

(4) 提倡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邓小平提出，要向前看，就要及时地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否则就不可能顺利地前进。当前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三个方面的问题。在管理方法上，要特别注意克服官僚主义，现在的机构臃肿、层次重叠，手续繁杂，效率极低，空谈淹没一切。要搞四个现代化，就非克服官僚主义不可；要学

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在管理制度上，要特别注意加强责任制，要切实地做到职责分明、赏罚严明，实行权责一致和权责到人。在经济政策上，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国家应当从各方面对西北、西南和其他一些生产和群众生活困难的地区从物质上给以有力的支持。这是一个大政策，是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在面临现代化建设新情况的时候，全党要善于重新学习。

邓小平的讲话实际上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从上述内容来分析，邓小平的讲话，已经包括了后来逐步形成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即邓小平理论的一些基本思想。这里面蕴含着建国以来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许多经验教训，而且包含一些前所未有的极为可贵的新思想和新的理论观点，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20 年后的 1998 年，江泽民总书记高度评价了邓小平的这篇讲话。他说：“邓小平同志在全会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为全会确定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认识和新决策奠定了重要基础。”

## 2.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历史贡献

在工作会议的基础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于 12 月 18 日至 22 日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 169 人，候补中央委员 112 人。韦国清、刘伯承等 27 人因事请假；中央政治局决定不通知有严重问题的 13 名中央委员、12 名候补中央委员出席会议。会议由华国锋主持。这次会议的历史功绩是：

第一，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会议深刻地回顾了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重申了毛泽东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的正确论断，指

出要严格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决不允许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界限，决不允许损害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全会果断停止使用和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错误口号和错误理论。为了迎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任务，全会决定从 1979 年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上的根本转变。

第二，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会议认真讨论了坚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问题，认为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才能顺利地实现工作中心的转移，正确的改革同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肯定了邓小平提出的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的正确观点。认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而不从实际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全会指出，毛泽东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不可磨灭的，他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不符合毛泽东历来对自己的评价。全会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这个讨论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第三，解决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问题，切实做到综合平衡。全会讨论和原则同意了 1979 年、1980 年两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并且提出必须逐步解决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失调状况，消除生产、建设、分配中的一些混乱状况，妥善解决城乡人民生活中多年积累下来的一系列问题。全会深入讨论了农业

问题。同意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发到各省、市、自治区讨论和试行。

第四，确定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全会指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企业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应该大力精简各级经济行政机构；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注意把思想政治工作与经济手段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干部和劳动者的积极性。要认真解决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全会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维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全会还提出，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设备。

第五，肯定历史上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及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全会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们对党和人民的贡献；撤消了中共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从而把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四人帮”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了过来，指出邓小平在 1975 年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取得了很大成绩，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决定永远废止过去那种脱离党和群众的监督，设立专案机构审查干部的方式，强调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必须遵循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只有坚决地平反假案，纠正错案，昭雪冤案，才能够巩固党和人民的团结。采取这些步骤，正是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表现。

第六，加强党的领导机构，健全民主集中制。全会决定在

组织上健全民主集中制和党规党法，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反对突出个人和搞个人崇拜。全会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全会考虑到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党的生活的实际变化和目前党的工作的迫切需要，决定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为中央委员，将来提请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对这一增补手续予以追认。为了维护党的纪律，全会选举产生了以陈云为第一书记、邓颖超为第二书记、胡耀邦为第三书记、黄克诚为常务书记的，由 100 名委员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 3.20 年后江泽民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评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以来“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使执政党的领导工作全面地实现了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从此，结束了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开始了我国社会经济、政治改革的新时期。这次全会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始形成的标志，也是以体制改革为内容的第二次革命的开端。因而，成为开辟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新时期的伟大起始点。

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方针、路线和政策，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从个人崇拜和严重的教条主义精神枷锁的束缚之下解放出来，“万马齐喑”的可悲局面一去不返。人民群众中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充分焕发出来了，各条战线都开始呈现出生机勃勃的生动情景。当然，这样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对人们思想上产生巨大冲击力，也是后人难

以想象的。那些深受“左”倾错误思想毒害的人，怀疑三中全会是在“砍旗”，一时在思想上转不过弯来，是可以理解的；也有少数人曲解“解放思想”的真正涵义，走到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极端，特别是曾经出现了诽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诬蔑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的言论甚至是行动。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策，经受了历史的检验。对它的评价正如邓小平当年评价真理标准大讨论那样：“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三中全会作为党的历史上、国家的历史上一个新的起点，其伟大的历史功绩，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为人们深刻理解，其伟大历史意义也愈加放射出不可磨灭的光辉！

20年后，江泽民《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一文中，总结了20年时间内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所取得的光辉而伟大的业绩，概括了三中全会以来执政党领导工作的主要历史经验，再次高度地肯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伟大的历史意义。他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党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是从这次全会开始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由这次全会揭开序幕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是以这次全会为起点开辟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是在这次全会前后开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光辉的标志，它表明中国从此进入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从三中全会开始实现全党全国工作重点的历史性转移开始，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中国人民在以后的岁月里，始终以饱满的建设激情和昂扬斗志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中华大地焕然一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柳暗花明，前程锦绣。沧桑巨变始于三中全会。正如江泽民所

说：“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很不寻常的会议。”

## 二、初步总结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

### ——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四中全会于 1979 年 9 月 25 日至 28 日在北京举行。出席全会的有中央委员 189 人，候补中央委员 118 人。中央机关和地方党委 16 名负责人列席了会议。会议由华国锋主持。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两项，一是通过叶剑英代表党中央、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在庆祝国庆 3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

#### 1. 讨论通过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3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中共中央决定由叶剑英代表党中央、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30 周年大会上讲话。这篇讲话分为三个部分：光荣伟大的三十年；决定国家命运的一场大决战；向着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前进。这篇讲话激动人心，感人肺腑。

第一，讲话向世界宣布中国共产党要继续高举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叶剑英在讲话中全面回顾了建国 30 年来的战斗历程，高度地评价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及老一辈革命家的不朽功绩。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第一次公开向世界庄严地宣告：中国共产党能够正确地对待自己的领袖，能够正确地看待自己的奋斗历史和正视工作中的重大失误，并且具有自己纠正错误的的能力；阐明了中国共产党要坚决地高举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去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从而坚定地回答了当时中国人民最为关心、也是世界